
共享经济的发展与政策推进

——以杭州市为例

李勇 何方方 珂梁娟^{*1}

【内容提要】:作为一种新的产业领域和经济形态,共享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正在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各地政府也在积极推进这一导向的经济发展,并制订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这些政策的制订需要应对共享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包括利益协调、平台建设、技术条件的完善、创新激励以及公共服务的匹配等要点。杭州市政府在推动共享经济的发展与运行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实践探索,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本文结合这些经验对共享经济发展的一些关键问题展开讨论,为共享经济的有序发展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关键词】:共享经济 杭州 政府治理 政策

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的发展,共享经济正在成为一个崭新的产业领域,并且快速发展。人们对于共享经济的成长期望很大,认为这是一个能够引领城市发展的、潜力巨大的经济领域^[1]。据调查分析预测,目前,中国共享经济市场规模可以达到近四万亿元,为五百万人提供就业机会^[2]。当然,共享经济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能够整合闲散资源,更在于培育了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和资源配置方式^[3]。这种经济模式降低了经济行为对于资源的消耗,也培育了新型的消费理念和社会关系,“降低了交易成本”^[4]。因此,这一经济形态的发展,对于推进地方经济和社会管理的演进、提高信息沟通和生产效益的能力、促进生产消费等各主体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并且在整体上提升社会生活的质量,都具有重要意义。

2015年以来,中国政府大力推进共享经济的成长,并把它作为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的重大引擎。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发展共享经济,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5],把共享经济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和新空间。各地政府也进行了许多努力,展开了许多实践探索,并且把发展共享经济作为当地经济发展的契机。本文以杭州市发展共享经济的经验为基础,讨论发展共享经济的一些基本条件、问题和政策措施。

一、共享经济在杭州的发展

“共享经济”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研究,最早起源于关于协同消费的专著^[6]。此后,随着互联网经济的持续推进,共享经济模式的应用面越来越广,其相关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也呈现着不断增长的趋势。对于“共享经济”,一些研究将其界定为一种以使用权的分享为基础的生产消费模式,即通过市场中介将使用权进行交易,而不发生所有权变更的经济形态^[7]。还有些研究指出共享经济模式是建立在使用权转移和对商品的重复利用之上利用闲置资源的^[8]。可见,共享经济是一种通过互联网平台资源,实现对闲置资源使用权的转移、交易和重复使用为特征的经济形态。

在发展共享经济的各个环节中,共享经济需要形成对生产过程中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共享的经济平台,沟通其中人、财、物的因素。这是共享经济发展的前提,也是其成败的关键所在。在杭州,自2013年以来,共享经济平台不断成长,其覆盖的领

¹ 作者:李勇、何方、梁娟,杭州市社会治理研究与评价中心主任、副主任、成员;(杭州310026)方珂,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杭州310058)

域也很广。其所涉及的领域包括房屋租赁、交通出行、知识学习、教育医疗、旅游休闲、美食健身等产业。这些平台既有杭州本土创业企业构建的,也有外来企业在杭建立的。如2015年6月15日在杭州上线的美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空格”APP,已经成为目前国内最大的个人创业服务平台。该产品未上线即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天使轮投资,上线60天就完成A轮1亿元人民币融资^[9]。再如杭州快驰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快货运”平台,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物流运输优化、解决方案服务,上线仅5个月,已将业务拓展至郑州、长沙、成都、杭州、西安等多个城市,并获得1000万美金风险投资^[10]。这些企业所涉及的领域很广,经济成分各异。在下表中,我们列举了一些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共享经济企业(见表1),以反映共享经济在杭州的发展程度。

表1 杭州部分共享经济平台及发展情况

编号	领域	名称	总部驻地	上线时间及融资情况
01	房屋住宿	Airbnb	旧金山	2008年8月成立,D轮融资4.75亿,2015年8月进入中国
		小猪短租	北京	2012年8月上线,2015年7月C轮融资6000万美元
		木鸟短租	北京	2012年5月上线,A轮融资6000万元
		爱上租	杭州	2015年10月,爱上租APP1.0上线
		驻客公寓	杭州	2014年11月成立,A轮融资超千万元
02	交通出行	滴滴出行	杭州	2012年8月上线,A轮融资1千万美元,2015年2月与滴滴打车、快的打车战略合并。
		Uber	旧金山	进入了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杭州等城市,2015年底,来自中国投资人资金接近20亿美元
		曹操专车	杭州	2015年下半年成立,2016年1月滨江公测
		一嗨租车	上海	2006年1月,2015年2月,一嗨接送APP上线,2014年11月,在纽约交易所上市,杭州有12家网点
		云泊	杭州	2015年投资1.2亿打造智能停车系统
		行呗(停车)	北京	2015年12月,杭州试水

03	生活服务	觅食	杭州	2015 年 1 月上线,A 轮融资 1500 万美元,获西湖区政府 325 工程 A 类企业 500 万元奖励
		吃几顿	杭州	2015 年 7 月上线,获多牛资本数百万元天使轮融资
		e 袋洗	北京	2013 年成立,2016 年 2 月与杭州联合银行跨界融合
		达达配送	上海	2014 年成立,已覆盖杭州
		小美快购	杭州	2015 年 10 月上线,主打“超市代购,一小时送达”,已登陆上海
		空格	杭州	2015 年上线 1 个月,A 轮融资 6000 万元
		乐刻健身	杭州	2015 年 5 月,A 轮投资 300 万美元
04	贷款	余额宝	杭州	支付宝推出的余额增值服务,实为货币基金
05	知识	猪八戒网	重庆	2006 年创办,C 轮融资 26 亿元
		在行网	北京	2015 年 3 月正式上线
		知乎网	北京	2010 年 12 月开放,获启明创投近千万美元
06	生产	阿里巴巴淘工厂	杭州	阿里巴巴旗下 1688 事业部上线的链接淘宝卖家与工厂的平台
		快货运	杭州	2015 年上线 5 个月,A 轮融资 1000 万美元
07	旅游	微隐旅游	杭州	2013 年 10 月平台上线,开发以杭州为中心四小时车程内的 172 个景区、3.4 万个房。A 轮融资千万
08	就医	丁香园	杭州	多平台融合的医患 O2O,获腾讯 7000 万美元战略投资

资料来源:基于杭州市政府的调查

从表 1 所反映的情况看,目前杭州市共享经济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气候。这一发展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其一,这些共享经济的生产领域主要集中在住宿、交通、生活服务等几个方面,且多数已获得了数额可观的融资。其二,这些企业的规模往往不大,多以小微企业为主,但也包括 Airbnb、Uber 等少数几家外来企业,以及滴滴出行、一嗨租车和余额宝等几家启动时间较早的本土平台。其三,这些共享经济平台的启动历史不长,特别是在 2015 年前后出现较多。在图表所列的共享经济平台中,成立于 2015 年前后的多达 13 家,占总量的 50%之多。

随着共享经济的成长,人们对共享经济的理念及共享经济企业特点的认识也不断加深,市民对于共享经济的认可度很高。以打车出行为例,在杭州各家共享平台中,杭州市民对于平台的知晓率,首先是滴滴出行(知晓率 97%),其次是 Uber (62.67%)、达达(35.00%)和帮帮(24.33%)。(具体见表二)。在加入这一平台的司机方面,据 2015 年数据,杭州注册 Uber 司机达 500 万,这为杭州创造了 20 多万个就业机会。再以美食共享平台“吃几顿”为例,2016 年 1 月,“吃几顿”平台上的认证厨师有 100 多位。平台至上线 5 个多月时,平均每天私厨上线率为 70%—80%,白领、孕妇、产妇是其基础订餐人群。

表 2

共享平台知晓率



资料来源：基于杭州市政府的调查

当然，由于共享经济的发展在杭州仍然是新事物，其发展的程度还十分有限。共享经济在杭州市的实践，仍然存在着一一些局限和问题。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领域还十分有限。如表一所示，杭州市共享经济平台在住宿、交通、生活服务等几个方面获得了良好的发展，出现了几家具有代表性的、资金实力强的共享经济平台。然而，较之于庞大的经济市场，共享经济目前的发展领域仍然十分有限。一方面，共享经济在杭州的衣食住行等方面获得了较好的发展，但是像在诸如教育、技能、资金等领域，共享经济还没有较多的涉及。另一方面，杭州市在生产、旅游、就医等方面也有几家运行的共享经济平台，但是这些平台无论从知名度还是成熟度等方面都与出行、住宿等领域的共享经济平台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第二，成长迅速、竞争激烈，但其发展的程度还十分有限，尚未形成稳定的格局。随着收入效益的持续显现，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投入共享经济平台的运营之中。因此，共享经济平台在近年来呈现井喷式的增长，出现了许多相互竞争的同质化平台。以杭州市的共享单车平台为例，自 2016 年 11 月“骑呗”单车进入杭州起，至 2017 年 3 月，杭州市区已经出现骑呗、ofo、小鸣、hellobike 等多种共享单车品牌，总量多达 7.3 万多辆，即将赶超 8.68 万辆的公共自行车。^[11]共享单车在短短几个月内的快速生长，只是杭州市成长迅速的共享经济市场的一个缩影。然而，这些成长迅速的共享经济平台并没有得到有序的管理，乱停乱放、管理失序等现象频繁出现。并且，平台之间过高的同质化趋向，也给这些平台的良性发展造成了威胁。

第三，政府对共享经济的管理还处在探索阶段。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共享经济在杭州的出现和成长仅仅经历了短短几年的时间。对于这种成长迅速的经济形态，政府在对相关事项方面的监管仍然还在探索。一方面，杭州市关于网约车、共享单车、“网络炒信”等几个方面的监管条例的出台，均明显滞后于这几种行为在经济市场上的出现。另一方面，杭州市关于共享单车、网约车的管理条例均仍处于试行阶段，还需要在实行过程中积累经验、逐步完善。

第四，共享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出现利益的冲突。共享经济在杭州市的快速发展，对传统的实体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譬如，滴滴、Uber 等网约车平台的上线，挤占了出租车的市场，造成了网约车与出租车之间的利益冲突；而摩拜、ofo 等共享单车在杭州的快速发展，则挤占了杭州市公共自行车的受众范围，冲击了杭州市公交自行车交通服务发展有限公司的政策红利。这些共享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利益冲突，可能引发共享经济从业人员与传统实体经济从业人员之间的冲突，也可能引发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冲突，从而给城市管理带来新的难题。

二、杭州市推进共享经济发展的政策实践

杭州市共享经济的发展，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鼓励和支持，共享经济的产业发展被政府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而受到积极鼓励。这些鼓励和推进政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打造信用城市，规范共享经济市场。“‘共享经济’是‘租赁经济’，也是‘信任经济’”^[12]，信用体系是共享经济发展的基石。近年来杭州市在推进信用建设方面进行了许多工作。杭州市建立起了网上个人信用查询系统，并在“信用杭州”的网站上设置“国家失信黑名单”、“省失信黑名单”、“长三角信用联动”等专栏，反映个人和单位的资信状况。在共享经济进入市场后，杭州市的征信系统与相应的产业领域进行了对接。以共享单车为例，征信系统的引入改变了共享平台以往只能依靠收取“押金”来制约用户行为的状况，避免了对交易成本和用户体验带来的负作用。从实施效果来看，征信系统的引入规范了共享经济的市场行为，减少了共享经济企业的运营成本。据“芝麻信用”数据显示，在共享单车企业引入信用分后，行业租金欠款率下降 52%，违章罚款欠款率下降了 27%，丢车比率下降 46%^[13]。可见，杭州市政府打造“信用城市”的进程，以及其推进个人征信系统建设的政策措施，为共享经济在杭州的有序发展创造了积极的外部条件。

2. 设置准入门槛，规范平台管理。早在 2016 年 10 月 31 日，杭州市政府便发布了《杭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和私人小客车合乘管理实施细则（试行）》，不仅对车辆及驾驶员的准入条件和资质设立了门槛，而且还对平台的责任进行了明确，要求平台配备安全生产专职管理人员，并为乘客购买承运人责任险。此外，杭州市政府还开设了“杭州市网约车申报服务管理系统”，对车辆的准入机制进行了规范化的管理，并且开放了平台资格信息、驾驶员资格信息以及车辆资格信息的在线信息查询窗口。截至 2017 年 2 月 27 日，全市共有 16802 名驾驶员申请网约车从业资格考试；共有 4169 辆车通过车辆综合性能检测^[14]。2017 年 3 月 1 日，杭州市交通运管部门向曹操专车、神州优车、首汽约车颁发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使其成为杭州市第一批具有合法经营资质的网约车企业。这些举措规范了对共享经济平台和参与主体的管理，也为社会公众对于共享经济平台的监督提供了渠道。

3. 推进社会协同治理，引导各参与主体介入共享经济的建设。为鼓励和引导社会主体参与到共享经济秩序的建设与维护中来，杭州市政府颁布了相关政策。例如，杭州市发改委于 2017 年 6 月 12 日发布了《关于对电子商务及分享经济领域炒信行为相关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行动计划》，对电子商务及分享经济领域炒信行为主体进行惩戒，并鼓励、引导有关企业参加联合行动。对于参加联合行动的企业提供的“炒信”主体，进行惩戒，并要求其他企业依据国家法律法规与用户签订协议，采取限制新设立账户、屏蔽或删除现有账户、限制发布商品及服务、限制参加各类营销或促销活动、扣除信用积分、降低信用等级等 13 项惩戒措施^[15]。通过这些政策文件的颁布，杭州市政府动员社会参与主体参与到共享经济市场的规范和失信惩戒之中，对于共享经济运行秩序的维护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4. 创新社会管理，提供技术支持。在市场的逻辑下，抢占市场份额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会使共享经济平台企业出现供给过

剩、管理失序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下，政府创新其社会管理，承担起相应的监管和服务职责。杭州市政府于 2017 年 4 月 26 日发布《杭州市促进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规范发展的指导意见（试行）》的征求意见稿，提出了政府监管平台、平台规范用户行为的管理逻辑，以及杭州的职能部门将引导平台控制投放总量、平台必须按“每 80 辆车配一名运维人员”的标准投入维护力量等规定。此外，由杭州市公共交通集团公司参股成立的金通科技也切入共享单车领域，并推出了“电子围栏”的技术，通过物联网芯片发射信号覆盖技术，让共享单车只有停放在规定范围内，才可以关上车锁并结束计费。目前，这一技术已经被“小鸣单车”等共享单车平台采用，为共享单车的有序停放提供了保障。可见，杭州市的这些举措，运用了“政府监管、企业运营”的管理模式，也为共享经济市场的规范管理提供了技术支持。至 2017 年 4 月，杭州在短短 5 个月内从一个仅有“骑呗”一家共享单车企业的城市转变为一个拥有近 10 家共享单车平台、26.3 万辆共享单车的城市^[16]。

四、杭州市发展共享经济的条件与原因

共享经济在杭州的良好发展，既得益于杭州市企业的努力和政府的积极推动，也得益于杭州在社会、经济、人文、管理等方面的诸多优势，和与其自身契合杭州市经济发展战略。具体而言，杭州市发展共享经济的条件和原因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杭州市具有有利于共享经济发展的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杭州的经济发展基础较好，在经济结构中，重工业的比重较低，轻工服务业的比重较高，^[17]特别是随着互联网和信息产业的发展，杭州具有阿里巴巴、网易等大型电商企业，成为我国互联网经济发展相关产业的领头羊。这也为发展以共享经济为基础的相关服务产业提供了条件。再者，近十年来杭州市政府所设立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把发展高科技、高新企业，以及电商、网络经济作为重要的导向，并为实现这些目标制定了很多政策，从而给予政策优惠和投资方面的支持^[18]。这为发展共享经济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杭州市具有良好的社会创新氛围。杭州在地方治理领域注重社会共治，通过“开拓新的治理领域、培育新型治理主体、构成新的治理聚合体等方法”^[19]来实现有效的共治。这种共治的氛围有助于促进杭州的社会创新，推动出台有助于地方经济发展的新型政策。同时，“杭州坚持‘城市管理为人民，城市管理靠人民，城市管理成果由人民共享，城市管理成效让人民检验’的理念”^[20]，政府决策注重民主参与。这种“民本”导向的城市管理理念有助于推进经济决策的民主参与和发展成果的全民共享。再则，杭州鼓励企业家的创新意识^[21]，“以市场导向的民间诱致型制度创新作为其动力，并将其所引发的活力和效率作为主要动力源”。^[22]在这一过程中，杭州诞生了鲁冠球、李书福、丁磊等一批批具有创新意识的企业家，并为杭州的产业和技术创新奠定了基础。

杭州市具有良好的教育和人才资源。杭州拥有一批以浙江大学为代表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这些科研机构既为杭州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智力和决策资源的支持，也为杭州的社会发展储备了大量的决策人才。从文化传统来说，浙江区域具有“义利并存”、“工商皆本”的思想遗产^[23]，有利于实现发展利益的全民共享，从而有助于共享经济实践及其政策创新在杭州的形成和推动。

最后，共享经济的发展与杭州市的发展战略相契合。按照人均 GDP 的国际标准，杭州市已经步入了发达国家（地区）的门槛。杭州市在“十三五”期间将以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作为其发展战略，并紧扣“互联网+”这一主题^[24]。共享经济运用互联网资源平台进行资源交换，以促进闲置资源使用权交易，并主要集中在出行、住宿等服务业领域，与杭州市的这一发展战略不谋而合。

五、相关政策问题的讨论

在目前有关杭州共享经济实际运营过程的讨论中，理论界对于这一发展进程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了批评和反思。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共享经济的生长会挤占一些公共空间，给城市管理带来了挑战。在杭州，迅速发展的共享单车引发了市场供给过剩、车辆随意停放、挤占城市公共空间的问题。其二，共享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规则真空。例

如，“网约车”所带来的“黑车合法化”、“共享单车”所带来的“儿童骑车上路”以及“共享充电宝”所带来的“个人信息盗取”等问题都给公共安全造成了隐患。其三，共享经济的发展制约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也会形成消费者与供给者的利益冲突。举例来说，“网约车新政”是杭州市政府为规范市场秩序所推出的政策举措，但其出台却增加了司机的市场准入门槛，并进而导致乘客的乘车成本和约车耗时出现上涨，从而引发了“私利”与“公利”之间的冲突。

学者关于共享经济的以上批评，反映了共享经济的出现给城市管理带来的一些新的问题。共享经济的发展给市民生活和城市经济带来的影响是双面的。一方面，共享经济的出现确实对实体经济造成了冲击，倒逼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共享经济运行过程中的规则真空以及利益冲突等问题，也给公共政策的推进带来了新的议题。

杭州市在“信用城市”建设、准入门槛设置、协同治理推进和技术支持完善等方面的政策推进，正是地方政府对于这些新议题的回应和尝试。具体而言，地方政府推进共享经济发展的政策制定需要思考一下几个方面的议题。

共享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利益分享，而如何在经济活动中建构互利的伙伴关系、形成利益协调机制，也就成为关键问题。地方政府需要通过制定各种具体的政策手段来促进这些利益协调机制和共享平台的构建和运作。要缓解这些矛盾，我们可以从杭州市的经验得到一些启示。杭州的经验启发我们要推进有关准则的讨论，包括对于不同行为主体利益的尊重，共享经济的社会性和公益性，共享行为的可持续性，共享经济的发展与公共服务体系的配套，共享经济的发展与公共服务体系的相互关系和协同，以及共享经济与分享经济之间的差别和联系。具体地说，杭州市发展共享经济的经验对于讨论共享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问题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同时，共享经济的发展和运作需要有其自身的共享平台。共享经济的健康发展，有赖于共享平台的持续搭建与完善。只有这样才能分解实物资产并像服务商品一样被消费^[25]，使共享平台起到匹配供需双方信息资源的作用。杭州市在各个领域形成并发展了一批新兴的共享经济平台，其中一些平台也获得了较大的市场知名度，占据了可观的市场份额，但是这些平台在行业规范、信用维护以及商业伦理方面还存在着一些现实问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完善。杭州市发展共享经济的经验表明，政府可以通过规范平台建设来促进行业自我完善、规范市场行为、鼓励信用体系建设，进行市场监管。

在共享平台建设的基础上，“共享经济”运行的核心机制在于运用互联网信息资源，实现闲置资源的有效调配。共享者所进行的闲置资源使用权的流通，以及被共享者对于共享性资源的使用，都需要基于共享平台的信息流动与匹配。杭州市依托其良好的互联网信息资源，创造了一批采取共享经济模式的新兴企业，促进了共享经济在杭州的运行与实践。然而，共享经济服务的安全性和专业性两大问题也早已成为各界诟病的问题。在技术条件完善的同时，共享经济的运行还需关注其自身的安全性和专业性。

此外，共享经济的发展需要与社会创新的要求相呼应。借助互联网技术手段，共享经济可以通过激发闲置资源活力，通过众包、众创等方式组织、整合社会资源参与到创新活动中来，大大提升创新效率，并大幅降低成本。杭州市的优惠政策和创新氛围吸引了创新型小微企业在当地的发展，也促进了一批共享经济平台的落地与运行。然而，共享经济的健康运行不仅需要政策支持方面鼓励创新，也需要在社会生活方式方面进行创新，因为共享经济所需要的是一种涵盖了共建共享、互利互惠与相互信任的全新的文化环境与生活方式。

最后，共享经济作为一种产业领域，与社会公共领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具有丰富的社会效应。为此，政府也要积极行动起来推进共享经济的发展，构建有利于“共享经济”发展的治理体系。共享经济机制的运行既需要实现主体利益与社会认同的结合，也需要对其运行过程中所存在的“规则真空、契约缺失和信息安全”^[26]等损害主体利益与市场秩序的问题进行适当的治理。在此意义上，如何顺应共享经济的发展趋势，创新其公共服务职能，实现公共服务与共享经济的有效匹配，既是新形势下政府建设的重要课题，也是推动共享经济有序发展所必须解决的问题^[27]。

根据杭州的这些经验，在推动共享经济的健康运行中，我们需要在三方面进行完善。其一，避免将传统的限制式的管理模式套用于共享经济，应鼓励共享平台企业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合理发展，然后针对发展存在的障碍和问题，适度调整或清理旧规则、建立新监管体系，如对社会保障、税收制度、就业指导等进行必要的调整。其二，要规划发展一些基础核心产业，如基于云端的网络搜索、识别核实、移动定位等产业，以此形成共享经济安全有序、高效运转的支撑环节。其三，推进政府自身职能的变化。要根据共享经济带来的新型产业形态，打破原有职能划分，重新调整职能领域，形成以信息经济、数字经济、信用经济、智能经济等新经济形态为内容的职能部门，以实现精准性的产业服务。

注释：

[1]乔洪武、张江城：《共享经济：经济伦理的一种新常态》，《天津社会科学》2016 年第 3 期。

[2]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2016 年度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

[3]肖薇、黄潇：《共享经济时代：共享服务业务向全球扩张》，《博鳌观察》2015 年第 4 期。

[4]《经济学人》：《崛起中的共享经济》，《经济导刊》2013 年第 Z1 期。

[5]《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15 年 11 月 4 日。

[6]Botsman, R., & Rogers, R., 2010. What's Mine Is Yours: The Rise of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Harper Business, New York. (参见 Cheng, MM., 2016. Sharing Economy: A Review and Agenda for Future Research.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57, 60~70.)

[7]Bardhi, F., Eckhardt, GM., 2012. Access-Based Consumption: The Case of Car Sharing. 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9(4), 881~898.

[8]Kathan. W, Matzler. K, Veider. V. The Sharing Economy: Your Business Model's Friend or Foe? [J]. Business Horizons, 2016(6), Vol. 59: 663~672.

[9]郎凯行：《上线 60 天 A 轮融资一个亿这个叫“空格”的 APP 为何如此吸金？》，浙江在线-浙商网 2015 年 9 月 15 日。

[10]陆群安：《快货运：颠覆传统，为货运插上翅膀》，《青年时报》2015 年 9 月 24 日。

[11]资料来源：杭州网：《谁更好骑？ 记者体验杭州四款共享单车》。

[12]肖建强、孙黎：《上善制度的炼成——马奇制度理论对创业与共享经济的启示》，《清华论坛》2016 年第 5 期。

[13]傅颖：《当分享经济遇上互联网+ 杭州领跑全国“信用城市”》，《浙江新闻》2017 年 4 月 18 日。

[14]刘文昭、胡菲菲：《杭州网约车新政过渡期结束 3 家平台获得“合法身份”》，杭州网 2017 年 2 月 28 日。

[15]资料来源：杭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

[16]数据来源：杭州交通主管部门。

[17]郭晶：《低碳目标下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与空间结构优化的协调——以杭州为例》，《城市发展研究》2010 年第 7 期。

[18]金雪军、章融、章华：《城市化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关系研究——以杭州市为例》，《中国软科学》2003 年第 7 期。

[19]王名、刘国翰：《增量共治：以创新促变革的杭州经验考察》，《社会科学战线》2015 年第 5 期。

[20]徐东涛、郎友兴：《地方治理精英与制度创新的关联性分析：以杭州为例》，《浙江社会科学》2012 年第 12 期。

[21]蒋泰维、段姗、宁建荣：《企业自主创新路径与政策环境互动的浙江模式研究》，《中国软科学》2009 年第 6 期。

[22]罗卫东：《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现代化进程的回顾与展望》，《浙江学刊》2000 年第 6 期。

[23]王自亮：《浙江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与现代化的人文动因》，《浙江学刊》2003 年第 4 期。

[24]史晋川：《杭州市的“互联网+”发展战略问题》，《杭州（周刊）》2015 年第 9 期。

[25]《〈经济学人〉：崛起中的共享经济》，《经济导刊》2013 年第 Z1 期。

[26]唐清利：《“专车”类共享经济的规制路径》，《中国法学》2015 年第 4 期。

[27]刘奕、夏杰长：《共享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动态》，《经济学动态》2016 年第 4 期。